

高管控制权、审计监督与激进避税行为*

代彬^{*1,2}, 彭程², 刘星³

(1.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重庆 400031;

2.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 重庆 400031;

3.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重庆 400030)

内容提要:内部权力配置和独立审计作为重要的内、外部公司治理安排,都将对企业的避税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以2008—2013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提高公司的税收激进水平,表明企业的激进避税策略蕴含了高管的权力寻租动机;不论是以“国际四大”或者“国内十大”作为审计质量的度量指标,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反而提高了公司的激进避税程度,揭示其在公司治理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强权高管的存在会进一步强化外部审计对公司激进避税行为的促进作用,预示具有较高声誉的“审计大所”可能成为了高管借避税交易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挡箭牌”甚至“合谋者”。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当前有关加强审计独立性和上市公司财务决策监管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关键词:高管控制权; 审计师; 审计质量; 激进避税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6)03—0067—13

一、引言

经济越发展,税收问题越重要。通过各种避税手段降低税负以藉此增加公司收益的行为似乎正演变为各国公司的现实选择,并最终影响社会福利(Weisbach等,2002)。在美国,企业避税活动被视作国家税务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Desai & Dharmapala,2006)。近年来,我国企业的激进避税现象也日益普遍,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重大损失^①。与此同时,关于避税行为影响因素和避税效果的研究也呈现出较为对立的结论,并衍生出避税的传统观和代理观两大阵营(Slemrod,2004; Desai & Dharmapala,2006)。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避税行为的差

异呢?理论上讲,避税策略是管理层对避税的收益、成本以及风险权衡后的结果。Hambrick & 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管的决策行为受其个人特征的影响,并获得了大量研究的证实。因此,探讨管理层特质因素如何影响避税行为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学者们也从管理者固定效应、个人经历、CEO类型等视角出发进行了初步探索(Dyreng等,2010; 蔡地、罗进辉,2015)。

上述研究无疑丰富了学术界对企业避税动因的了解。但稍显遗憾的是,基于管理层视角的企业控制权配置特征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足够重视。Aghion & Bolton(1992)率先在公司治理研

收稿日期:2015-10-26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控制权配置、审计监督与国企高管自利行为”(714021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制度环境、公司财务政策选择和动态演化研究”(71232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企业投融资互动决策及其社会效益的实现研究”(10XGL004)。

作者简介:代彬*(1982-),男,重庆人,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审计与公司治理,E-mail:cqdaibin@163.com;彭程(1978-),男,湖南娄底人,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与投融资管理,E-mail:pengcheng96@126.com;刘星(1956-),男,河南镇平人,教授,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E-mail:liuxing@cqu.edu.cn。*为通讯作者。

^①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表明,2013年和2014年我国的反避税工作为国家贡献税收分别高达481亿元和523亿元。

究中引入对控制权的探讨,并以类别迥异的企业权力结构为出发点分析了高管的决策表现及其效率差异。从形成机理上看,企业避税策略是管理者动机与行为的直接体现,高管有可能通过激进避税策略将经济资源更多地留存于公司内部,并用作企业扩张或攫取私利的资金来源。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时,不同权力的高管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乃至自身利益函数产生异质预期,进而对避税的成本和收益做出不同的评估,这势必会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

另外,高管的避税决策还必然与为其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产生关联。国外学者基于发达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显示,外部审计制度所履行的监督、鉴证、评价、控制等职能行为有助于降低公司治理中的道德风险和代理成本,约束经理人自利行为,行使着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职责。最近十多年来,我国为加快会计师(审计)事务所改革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举措,诸如脱钩改制、合并重组等,使得审计监督所具备的监督功效在改善财务报告质量等领域赢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以控制权配置、政治关系等为表现载体的非正式制度,同样会对转型国家中审计师如何发挥治理效应意义深远(Fan & Wong, 2005)。那么,结合当前我国的现实制度背景,在抑制企业的激进避税方面,独立审计能够展示出应有的治理功效吗?与此相应的,强权高管的存在又是否会牵掣审计师的履职行为呢?

基于对企业避税行为诱因及治理机制的综合考量,加之对目前研究缺憾的弥补和拓展,共同形成了本研究选题的缘起和契机。本文首先以企业的控制权特征为切入点,搭建了“权力配置与高管自利动机—审计监督—激进避税决策”这一逻辑架构,然后利用2008—2013年的7027个上市公司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提高公司的税收激进水平;而不论以“国际四大”或者“国内十大”作为审计质量的度量指标,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反而提高了公司的激进避税程度;进一步研究表明,高管控制权的增强强化了外部审计对公司激进避税行为的促进作用。另外,由于潜在的自我选择性偏误可能使上述检验招致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文利用Heckman二阶段回归法进行了稳健性测试,发现主要实证结果并无显著差异。

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通过阐释高管的控制权特征对公司避税策略的影响以及审计师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本文不但以避税这一具体的财务决策为例对Bebchuk等(2002)提出的“管理层权力论”增添了来自中国的经验佐证,同时,对McGuire等(2012)关于审计师特征如何影响避税行为的研究在我国新兴加转轨制度背景下进行了有益拓展,并且对理解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控制权的经济后果以及外部审计的行为模式也具有重要价值,还为当前有关深化公司治理改革和提高审计师独立性的政策导向提供了更为细致的线索。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会计系统能否有效运行,必须考虑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包括避税策略在内的管理层决策必然受到所处公司治理特征的影响,并最终在内、外部激励(约束)因素的联合决定下保持一个相对均衡状态,相应地,这也成为本文理论推演的逻辑主线。

1. 高管控制权与激进避税行为

税收筹划是企业经营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合理筹划并降低税负支出自然也受到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在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冲突不断加剧的现实背景下,高管会从自身效用最大化角度出发,对避税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权衡,其权力的行使对公司避税策略的影响尤为重要。一方面,随着董事会与监事会监督作用的相对弱化,加之管理层权力本身的不断增强,此消彼长之下高管的寻租能力随之提升,权力自利途径也更加多元化(刘星等, 2012);另一方面,由于避税手段通常较为复杂且不透明,强有力的高管控制权也为激进避税行为提供了稳定有效的实施环境和安全保障,可能会增强高管利用避税活动寻租的动机。

基于上述思路,一些学者主要从代理视角出发提供了相应的研究证据。Slemrod(2004)发现,公司通过激进避税策略节余的资金可能被高管所侵占,从而导致避税掩饰下的高管权力自利行为更为突出;Desai & Dharmapala(2006)以及Hanlon & Heitzman(2010)的研究表明,缺乏有效监管的高管会采取激进的避税决策,并且激进避税与高管的权力寻租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寻租行为会进一步增强高管实施避税交易的意愿和能力;Kang & Ko(2014)指出,在激励契约失效的情形下,管理层

会倾向于采取激进避税行为;Laguir & Stagliano (2014)的研究证实,权力较大的CEO会实施更为激进的避税战略,并据此攫取了更多的控制权私利;谢盛纹、田莉(2014)在国内学者中首次针对这一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研究也发现,高管权力越大,公司税收激进程度越高。

本文认为,管理层在“自利动机”驱使下,会采取各种自利性决策以谋求私人利益,而通过复杂、隐蔽的避税活动不但能够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和净收益,也提高了外部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监督内部人行为的难度,降低了高管获取控制权私利的成本和风险。因此,在监督约束机制相对孱弱的现实治理情景下,避税行为更容易成为内部人寻租的“良好载体”,使得避税与寻租之间的反哺效应可能更为显著,即权力越强的高管,越可能采取激进的避税策略。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₁:高管的控制权越强,公司激进避税行为越严重。

2. 审计监督与激进避税行为

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监控工具及治理手段”,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通过约束经理人的自利行为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得审计师在改善公司治理效率方面被寄予厚望。税负信息的确认和披露是企业财务报告的重要构成和审计师的重点审计事项,因此,作为代理问题表现形式之一的激进避税行为也理应受到审计监督机制的影响。

一方面,外部审计对客户的激进避税行为可能发挥约束作用。出于风险控制考量,审计师通常会对公司的税收合规性给予充分关注。当激进避税成为管理层寻租的重要手段时,会相应地增加审计的复杂性与难度,以及因审计失败引发的法律诉讼、政府监管惩罚以及声誉损失等(金鑫、雷光勇,2011)。为此,审计师有动机恪守独立性与专业判断,通过实施追加审计程序、出具更严格的审计意见等手段发挥其外部治理功能。Fan & Wong (2005)等也指出,在新兴市场国家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是监督内部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措施。

另一方面,外部审计对客户的激进避税行为也可能发挥助长效应。由于涉及大量的税法与财务知识,避税活动具有极强的专业性。高质量的审计师通常具有更为丰富的税务经验和发现避税机会的能力,更容易通过提供税务筹划或咨询服务、帮

助客户采取更加隐蔽复杂的交易来实现避税目的、掩饰避税行为,这甚至被一些以“四大”为代表的“审计大所”当作吸引和招揽客户的重要手段,从而助长客户的避税激进性。而近年来中国的审计市场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司法体系的局限使得审计师因协助客户避税招致的诉讼风险相对较低。在竞争压力和高额回报驱使下,会计师事务所也积极将其核心业务向避税服务领域延伸,审计师与客户合谋避税等现象日益突出。2005年,德勤华永主动帮助审计客户古井贡利用税收政策漏洞偷逃税款超过1.5亿元的事件曝光,揭示作为高质量审计代表的“大所”在客户避税行为中甚至可能充当“始作俑者”的角色。

一些学者也针对这一话题展开了探讨。McGuire等(2012)认为,审计师提供税务服务会提高客户避税程度,而是否由“四大”审计对客户避税行为没有显著影响;金鑫、雷光勇(2011)发现,审计师的审计质量越高,对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陆菲、胡永亮(2013)指出,由“四大”审计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税收规避程度;而魏春燕(2014)认为,在审计师独立性较差的情况下,具有行业专长的高质量审计并未能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反而提高了客户避税程度。总的来说,关于外部审计如何影响公司避税决策的经验证据尚不充分,结论也并不明确,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2a}: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抑制公司的激进避税行为。

H_{2b}: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促进公司的激进避税行为。

3. 高管控制权、审计监督与激进避税行为

由于上市公司避税行为受制于管理层和审计师的共同作用,导致企业的内部治理情景也会对独立审计施加影响。审计师的审计判断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管理层动态博弈的结果。如果公司的“内部人”能够对审计师的选聘、报酬等赋予较强的影响力,作为外部审计机制“灵魂”所在的独立性就不可避免地遭受负面干扰。而对权力的规范运行和有效监控则是高质量公司治理的核心要义所在,这样的氛围将有助于抑制高管对外部审计的牵掣,以此确保审计监督功效的优化和提升。

那么,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强权高管的存在如何影响外部审计的治理功效呢?由于普遍出现的

“内部人控制”让公司高管实际上成为决定审计师选择与薪酬的审计委托人,导致审计师聘任决策受到高管的决定性影响(张敏等,2010)。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保障机制的缺失自然会引发对独立性的侵蚀,企业“内部人”的寻租行为可能扭曲审计委托关系,致使审计师无法独立自主地形成审计判断,而强权高管通常在与审计师的沟通方面掌握更大的话语权。作为佐证,余宇莹(2013)等发现,低效的公司内部治理状况对审计质量造成了损害。而与此相对应,不少研究却指出,对于被贴上了“高质量”标签的审计师而言,其对特定客户的依赖程度普遍不太明显,拥有的讨价还价能力更强,对自身的声誉风险也更为敏感,因此,在实际面临客户的“游说”甚至“胁迫”时能较好地坚守审计原则和立场(刘文军,2012)。近年来,为了进一步引导和优化审计市场的竞争格局,以财政部、证监会为代表的监管部门持续不断地发布和实施了大量颇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主旨即在于保障和加强审计师的独立性。因此,若假设 H_{2a} 成立,那么高管控制权的增强既可能弱化外部审计的治理效应,也可能难以牵掣审计师的约束效力;而如果假设 H_{2b} 成立,高管控制权的增强则能够对外部审计与公司激进避税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形成强化效应。糅合上述分析,本文难以就高管控制权如何调节独立审计的监督功效得出确切的推论,但是,预期能够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3 : 高管控制权的增强能够影响外部审计与公司激进避税行为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我国于2007年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并于2008年执行新企业所得税制度,本文首先选取2008—2013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原始样本,并依次执行如下遴选标准:删除金融行业样本;删除ST、PT样本;删除审计意见为“拒绝”或“否定”类别的样本;删除当期所得税费用小于等于零的样本;删除数据无法补全的样本。经过上述遴选标准,本研究的最终样本库为7027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研

究涉及的公司治理、财务信息等数据主要取自CSMAR和WIND数据库,另有部分来自手工采集,并以随机抽样的方式与上市公司年报进行了交叉验证。同时,为缓解个别异常值可能带来的干扰,本文在回归检验中对主要连续变量按照上下1%采取了Winsorize缩尾处理。

2. 变量定义

(1) 高管控制权。高管控制权是以CEO为代表的核心管理层所拥有的、在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能够发挥重要影响作用的权限或能力。对高管控制权的测度虽有多种方法,但缺乏直接的度量指标。本文在Finkelstein(1992)提出的权力模型基础上,借鉴刘星等(2012)等文献的做法,具体从以下八个方面刻画高管控制权特征:

① 管理层结构:如果CEO同时在董事会内部也有要职在身时,通常具备更显著的影响力。本指标当CEO在董事会内部无任职时赋值为0,若任董事和董事长时分别赋值1和2。

② CEO持股情况:持有股份的CEO被授予了股东与管理者的“两栖身份”,更有助于其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发挥作用。本指标在CEO持有所在企业股份时赋值为1,否则为0。

③ 董事会规模:一些学者发现,管理层权力会伴随着董事会人数的扩充而相应得以强化(Morse等,2011)。本指标以行业中位数为标准,当董事会人数大于该标准时赋值为1,否则为0。

④ 独立董事履职能力:一般认为,若独立董事距离上市企业的注册地越邻近,预示其能够更便捷地履行监督职能,从而削弱和制约管理层权力。本指标当独立董事所在地与企业注册地不一致时赋值为1,否则为0。

⑤ 高学历和高职称^①情况:Finkelstein(1992)指出,拥有高学历或高职称的管理者更容易通过对自身专业声誉的塑造和运用,在公司的重大决策中施加个人影响。本指标当CEO符合高学历/高职称的其中之一时赋值为1,否则为0。

⑥ CEO任期:随着工作时间的积累,核心高管越容易通过“职位任免”等多种手段在组织内形成“利益均沾”的牢固同盟关系。本指标以行业中位

^①本文定义的高职称是指高级工程师、高级建筑师、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律师、教授、研究员等;高学历是指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数为标准,当 CEO 任职时间大于该标准时赋值为 1, 否则为 0。

⑦ 其他企业兼职情况:如果管理者在本企业之外兼有职务时,预示能够运用更为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有助于其在公司战略决策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本指标当 CEO 在其他企业兼有职务时赋值为 1, 否则为 0。

⑧ CEO 政治关联: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与政府关系更紧密的高管会在公司内部形成“堡垒效应”,进而阻塞公司治理机制的正常运行。本指标当 CEO 具备政治关联^①时赋值为 1, 否则为 0。

上述八个方面从不同的维度刻画了高管控制权的属性特征,不过,单独审视这些维度,都各自存在视角盲区,难以做到准确无偏地度量。借鉴刘星等(2012)的做法,本文利用下面两种方法对高管控制权的以上八个特征维度进行合成处理,并最终获得一个综合性变量:①对八个特征维度简单加总后计算平均值,生成综合指标 $POWER_{avg}$;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八个特征维度计算出一个主成分综合得分,并以此生成综合指标 $POWER_{pca}$ 。根据指标构建原理可知, $POWER$ 值越大,说明高管的控制权越强。

(2) 审计监督质量。如何准确、有效地度量审计质量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难题。审计质量通常由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觉察并披露重大错报的两方面因素所共同决定(DeAngelo, 1981)。根据“声誉假说”以及“深口袋假说”,规模更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趋向于更严格的遵循审计程序,从而面临较低的审计失败概率,经其审计的财务报告通常更具可靠性,因此,提供了相对更高的审计质量(Fan & Wong, 2005),而事务所规模也逐渐成为审计质量的“最佳”替代。借鉴吴昊旻等(2015)等国内相关研究,本文分别以“国际四大”($AUDIT_4$)和“国内十大^②”($AUDIT_{10}$)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性测度:如果上市公司聘请的审计师为“国际四大”或“国内十大”,本文据此界定为高质量审计并将该变量赋值为 1, 否则为 0。

(3) 激进避税程度。关于避税行为的测度有多

种方法,目前国内外广泛采用的一般有以下三类:一是有效税率法,但由于我国的税收政策较为复杂,上市公司通常享有广泛的税收优惠且名义税率不尽相同,使得此方法易造成公司间横向不可比,而且难以度量企业主观避税程度;二是会计—税收差异法,但 Hanlon & Heitzman(2010)等指出,这一指标易受盈余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并且难以从指标中进行有效分离;三是 Desai & Dharmapala(2006)提出的固定效应残差法,用扣除应计利润影响之后的会计—税收差异来刻画企业避税程度。金鑫、雷光勇(2011)等认为,该方法能更为准确地测度和反映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因此,本文也采纳这一方法,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BTD_{i,t} = \beta_1 TACC_{i,t} + \mu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BTD = 税负差异/资产总额, 税负差异 = 税前会计利润 - (所得税费用/名义税率); $TACC$ = (净利润 -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资产总额; $\mu_i + \varepsilon_{i,t}$ 用来测度企业的避税激进程度 TA , 该值越大,则预示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越严重。

3. 模型设计

本文使用如下模型检验高管控制权、审计监督与激进避税行为之间的关系:

$$TA_t = \beta_0 + \beta_1 POWER_t + \beta_2 ROA_t + \beta_3 LEV_t + \beta_4 SOE_t + \beta_5 PPE_t + \beta_6 INTAN_t + \beta_7 SIZE_t + \beta_8 GROWTH_t + \beta_9 AGE_t + \sum Ind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2)$$

$$TA_t = \beta_0 + \beta_1 AUDIT_t + \beta_2 ROA_t + \beta_3 LEV_t + \beta_4 SOE_t + \beta_5 PPE_t + \beta_6 INTAN_t + \beta_7 SIZE_t + \beta_8 GROWTH_t + \beta_9 AGE_t + \sum Ind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3)$$

在模型(2)和模型(3)中,因变量 TA 为本研究采用的税收激进性代理变量; $POWER$ 指标用来测度高管控制权特征; $AUDIT$ 指标用来测度审计监督质量。借鉴 Dyreng 等(2010)以及 Kang & Ko(2014)等相关研究做法,本文在模型中还设置了如下的控制变量: ROA (盈利能力)、 LEV (财务杠杆)、 SOE (产权性质)、 PPE (固定资产比率)、 $INTAN$ (无

^① 借鉴相关研究,本文对政治关联的识别根据 CEO 是否为现任(或曾任)的政府官员来加以界定。

^② 本文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其网站(<http://www.cicpa.org.cn>)上每年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百强排名的前十名作为“国内十大”。

形资产比率)、*SIZE*(企业规模)、*GROWTH*(成长性)以及*AGE*(上市年限)。另外,在模型中也加入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

若本文的假设 H_1 以及假设 H_{2a} (H_{2b}) 获得支持,可以推断 *POWER* 变量应呈现显著为正的回归系数,而 *AUDIT* 变量呈现出显著为负(正)的回归系数。在此基础上,为探究审计监督对激进避税行为

的影响在不同高管控制权特征下可能的异质变化,本文在模型(3)中以行业中位数为标准,按照 *POWER* 变量与该标准的对照结果将企业分别归类为强、弱控制权组,然后针对 *AUDIT* 的回归系数通过 *Chow-test* 进行差异显著性测试,并以此作为假设 H_3 的验证手段。

本文中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和计算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与计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或计算方法
因变量	避税程度	<i>TA</i>	参见文中计算方法
解释变量	高管控制权	<i>POWER_avg</i>	高管控制权的等权平均值综合指标
		<i>POWER_pca</i>	高管控制权的主成分综合指标,根据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选择前四个主成分构造综合得分
	审计监督质量	<i>AUDIT_4</i>	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时取值为1,否则为0
		<i>AUDIT_10</i>	会计师事务所为“国内十大”时取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盈利能力	<i>ROA</i>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财务杠杆	<i>LEV</i>	负债总额/平均资产总额
	产权性质	<i>SOE</i>	若为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
	固定资产比率	<i>PPE</i>	固定资产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无形资产比率	<i>INTAN</i>	无形资产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企业规模	<i>SIZE</i>	平均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成长性	<i>GROWTH</i>	营业收入增长率
	上市年限	<i>AGE</i>	上市年限加1后取自然对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四、实证结果

1. 描述性统计

表2提供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高管控制权变量 *POWER_avg* 和 *POWER_pca* 基本上展现出相对吻合的统计形态,而与刘星等(2012)的统计结果相比略有提高,反映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控制权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AUDIT* 的数值表明,样本中接近四分之一的公司聘任了“国内十大”作为审计师,而欧美发达资本市场审计师集中于“国

际四大”的情形在我国也并不明显。就其他变量统计结果而言,*ROA* 的均值为0.048,相对较低的数值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还有待提高;*PPE* 和 *INTAN* 的数值对比印证了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重固定资产投资、轻无形资产投资的倾向;*GROWTH* 的均值较高,达到了0.218,但是,也有约四分之一的公司其增长率尚不足2%。另外,各变量的25%分位数和75%分位数表明,上市公司相互之间在高管控制权以及避税程度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避税程度	<i>TA</i>	7027	0.000	0.048	-0.020	0.005	0.026
高管控制权	<i>POWER_avg</i>	7027	0.506	0.185	0.375	0.500	0.625
	<i>POWER_pca</i>	7027	0.000	0.474	-0.259	0.023	0.264
审计监督质量	<i>AUDIT_4</i>	7027	0.066	0.241	0	0	0
	<i>AUDIT_10</i>	7027	0.243	0.415	0	0	0
盈利能力	<i>ROA</i>	7027	0.048	0.056	0.026	0.044	0.072

变量名称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财务杠杆	LEV	7027	0.492	0.173	0.378	0.507	0.614
产权性质	SOE	7027	0.601	0.482	0.000	1.000	1.000
固定资产比率	PPE	7027	0.240	0.159	0.132	0.204	0.326
无形资产比率	INTAN	7027	0.047	0.056	0.015	0.033	0.059
企业规模	SIZE	7027	21.760	1.088	20.958	21.601	22.474
成长性	GROWTH	7027	0.218	0.426	0.019	0.169	0.346
上市年限	AGE	7027	2.415	0.694	2.131	2.581	2.801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3提供的单变量检验结果显示,不论是以POWER_avg还是POWER_pca作为测度指标,激进避税程度在强控制权组均拥有显著更大的均值和中位数;不论是以AUDIT_4还是AUDIT_10作为审计监督质量的测度,选择“国际四大”或者“国内十

大”作为审计师的公司其激进避税程度的均值和中位数均显著较大,表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能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监督效应,反而助长了客户的激进避税行为。这些证据汇合在一起,初步印证了本文的假设H₁和假设H_{2b}。

表3 高管控制权、审计监督与激进避税行为:单变量检验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T-test T值	Wilcoxon test Z值
根据POWER_avg分组	强控制权组	2509	0.017	0.019	3.30***	3.09***
	弱控制权组	4518	-0.010	-0.008		
根据POWER_pca分组	强控制权组	3470	0.015	0.016	2.94***	2.85***
	弱控制权组	3557	-0.014	-0.011		
根据AUDIT_4分组	四大审计	464	0.021	0.023	2.74***	2.63***
	非四大审计	6563	-0.002	-0.003		
根据AUDIT_10分组	十大审计	1708	0.016	0.017	2.34**	2.21**
	非十大审计	5319	-0.004	-0.005		

注:以行业中位数为标准,将POWER值大于该标准的观测值划入强控制权组;表中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避税程度变量TA的相应数值;***、**、*分别表示双尾检验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 回归分析

表4提供了针对假设H₁及假设H₂的实证结果。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不论是以POWER_avg还是POWER_pca作为测度指标,高管控制权变量均呈现出显著为正的回归系数,并且至少在1%的水平上显著。也即是说,高管控制权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更为激进的避税策略,揭示企业的避税程度确实伴随着高管权力强度的擢升得到了显著增强。有趣的是,第(3)列和第(4)列中AUDIT变量均显示其呈现出显著为正的回归系数,并且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换言之,倘若选择“国际四大”或“国内十大”作为审计师,反而会提高企业的激进避税程度,这与陆菲、胡永亮(2013)

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表明在执业环境相对严峻的现实治理语境下,具备品牌和声誉优势、具有更高审计质量的“大所”可能在公司避税决策中扮演了合谋者的角色。

综上,本文提出的假设H₁和假设H_{2b}获得了实证结论的响应,即:强权高管的存在会诱发企业采取更为激进的避税决策,而理应具备更高监督功效的审计师并没有成为降低企业代理冲突的替代性治理机制,反而对避税活动发挥了促进效应。另外,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固定资产比率越高、规模越庞大、成长性越优异以及企业年限越久,均会强化公司的避税激进性,而财务杠杆的提高和国有属

性对激进避税则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与已有的相关研究较为一致。

表4 假设 H₁ 和假设 H₂ 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 TA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i>POWER_avg</i>	0.021 *** (3.32)			
<i>POWER_pca</i>		0.029 *** (3.13)		
<i>AUDIT_4</i>			0.011 ** (2.34)	
<i>AUDIT_10</i>				0.008 ** (2.15)
<i>ROA</i>	0.113 *** (3.75)	0.112 *** (3.64)	0.114 *** (3.79)	0.114 *** (3.76)
<i>LEV</i>	-0.065 ** (-2.12)	-0.067 ** (-2.16)	-0.069 ** (-2.30)	-0.068 ** (-2.24)
<i>SOE</i>	-0.004 * (-1.81)	-0.003 * (-1.72)	-0.004 * (-1.76)	-0.004 * (-1.82)
<i>PPE</i>	0.042 *** (2.76)	0.041 *** (2.61)	0.042 *** (2.69)	0.043 *** (2.83)
<i>INTAN</i>	0.033 (1.27)	0.036 (1.32)	0.047 (1.33)	0.042 (1.31)
<i>SIZE</i>	0.016 ** (2.23)	0.015 ** (2.17)	0.016 ** (2.18)	0.017 ** (2.20)
<i>GROWTH</i>	0.008 *** (2.74)	0.009 *** (2.80)	0.009 *** (2.93)	0.009 *** (2.88)
<i>AGE</i>	0.005 * (1.83)	0.005 * (1.78)	0.004 * (1.69)	0.005 * (1.81)
<i>Constant</i>	-0.085 *** (-4.36)	-0.082 *** (-4.17)	-0.078 *** (-4.23)	-0.087 *** (-4.52)
年度与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Adj. R²</i>	0.136	0.132	0.131	0.135
<i>P</i>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样本量	7027	7027	7027	7027

注:为控制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回归系数的 *t* 值均进行了 White(1980) 稳健性修正和 Cluster 调整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5 报告了不同的高管控制权特征下外部审计影响公司激进避税行为的回归结果。测试表明,高管控制权的指标差异对结论没有实质性影响,因此,后文中只汇报了以 *POWER_avg* 度量高管控制权的结果。可以发现,不管是用 *AUDIT_4* 还是 *AUDIT_10* 衡量审计质量,*AUDIT* 变量的回归系数虽然均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不过,在强、弱控制权组之间存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的差异。为了得到更为精准的检验结果,本文利用 Chow-test 对 *AUDIT*

变量的回归系数在不同组别中,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在强控制权组中,*AUDIT* 变量具有显著更大的回归系数,即高管控制权的增强能够进一步强化外部审计与公司激进避税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从而也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H₃。

上述证据表明,在强权高管的干预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大所”更容易在避税问题上与客户结为利益同盟,并凭借自身在税务经验、专业判断等

领域的优势协助客户实施更为激进的避税策略,这同时预示作为“外部监控工具及治理手段”的审计师在企业内部权力配置等因素的干扰下,其本身也可能成为公司代理成本的一部分。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审计行业结构不尽完善、法律诉讼风险相对较低等缺陷导致了审计师执业激励与约束的异化,并因此扭曲了“事务所规模—审计质量”理

应存在的正向关系。目前,一些研究也指出,“大所”的审计质量并非一贯地高,甚至当面临较差的制度环境时会相机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服务(Ke等,2015)。立足于新兴加转轨的现实情景,这一发现提示,在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的审计问题时,需考虑治理环境差异对高质量审计供给与需求的可能影响。

表 5 假设 H₃ 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 TA			
	强控制权组	弱控制权组	强控制权组	弱控制权组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AUDIT_4	0.015*** (2.77)	0.007* (1.83)		
AUDIT_10			0.013*** (2.51)	0.006* (1.71)
ROA	0.117*** (3.91)	0.109*** (3.20)	0.116*** (3.73)	0.108*** (3.07)
LEV	-0.056** (-2.17)	-0.071*** (-2.52)	-0.056** (-2.12)	-0.072*** (-2.53)
SOE	0.003 (1.36)	-0.006** (-2.04)	0.004 (1.38)	-0.006** (-2.10)
PPE	0.045*** (2.77)	0.039*** (2.56)	0.046*** (2.89)	0.037*** (2.47)
INTAN	0.034 (1.03)	0.050 (1.41)	0.031 (0.94)	0.052 (1.53)
SIZE	0.012* (1.68)	0.017** (2.21)	0.011 (1.56)	0.017** (2.33)
GROWTH	0.007** (2.32)	0.009*** (2.81)	0.007*** (2.46)	0.009*** (2.83)
AGE	0.007** (2.01)	0.004* (1.66)	0.009** (2.29)	0.004* (1.64)
Constant	-0.069*** (-3.43)	-0.081*** (-4.25)	-0.074*** (-3.45)	-0.088*** (-4.49)
年度与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 R ²	0.125	0.137	0.128	0.139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样本量	2509	4518	2509	4518
Chow-test	F = 3.44*		F = 2.96*	

注:以行业中位数为标准,将 POWER_avg 值大于该标准的观测值划入强控制权组,表 6 中做相同处理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3. 进一步的研究

(1)内生性检验。对上述结论的一个潜在困扰是,本文隐含的假定企业与审计师之间审计委托关系的形成是外生决定的,因此,自我选择偏误带来的问题无需考虑,然而,现实情境可能并非如此。例如,在避税活动中,更为激进的公司可能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作为审计师以向投资者释放正面积极的信号,并缓解投资者的顾虑和质疑;而高质量的审计师或许出于“性价比”等因素的权衡,也对客户存有“挑肥拣瘦”之嫌,从而引发某种程度上的估计偏倚。

为此,本研究利用 Heckman 二阶段回归法处理内生性问题。第一步模型为基于 Probit 模型的审计师选择回归^①,并将计算获取的逆米尔斯比率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第二步模型。参考魏春燕(2014)等相关文献做法,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决定审计师选聘的其他特征因素:高管控制权强度(*POWER_avg*)、盈利状况(*ROA*)、杠杆比率(*LEV*)、产权属性(*SOE*)、企业规模(*SIZE*)、成长性(*GROWTH*)、

制度差异(*CROSS*,企业存在交叉上市时取值为1,否则为0)、区域差异(*ZONE*,若企业注册地位居我国东部时赋值为1,否则为0)、财务危机(*LOSS*,若企业在 $t-1$ 年出现亏损赋值为1,否则为0)。另外,在第一步的 Probit 模型里还对行业及年度因素进行了考虑。第一步模型设置如下:

$$AUDIT_{4t} = \beta_0 + \beta_1 POWER_{avg_t} + \beta_2 ROA_t + \beta_3 SIZE_t + \beta_4 GROWTH_t + \beta_5 LEV_t + \beta_6 CROSS_t + \beta_7 ZONE_t + \beta_8 SOE_t + \beta_9 LOSS_t + \sum Ind + \sum Year + \varepsilon \quad (4)$$

表6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除“强控制权组”之外 *IMR* 的回归系数较为显著,揭示本文的确存在部分的自我选择偏误。不过,在考虑了这一问题后,主要的实证结果(特别是 *AUDIT_4* 变量)同表4和表5基本保持一致。据此,可以认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没有因潜在自我选择偏误遭受严重的内生性干扰,实证结论是较为稳健、可靠的。

表6 Heckman 两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Probit 模型 (因变量 = <i>AUDIT_4</i>)	主模型(因变量 = <i>TA</i>)		
		全样本	强控制权组	弱控制权组
<i>AUDIT_4</i>		0.013 ** (2.24)	0.016 *** (2.62)	0.007 * (1.74)
<i>ROA</i>	1.011 * (1.64)	0.112 *** (3.18)	0.114 *** (3.29)	0.110 *** (2.87)
<i>LEV</i>	-0.934 *** (-3.18)	-0.072 ** (-2.34)	-0.057 ** (-2.18)	-0.076 *** (-2.60)
<i>SOE</i>	0.089 * (1.77)	-0.005 * (-1.81)	0.001 (1.22)	-0.006 ** (-2.04)
<i>SIZE</i>	0.585 *** (6.26)	0.014 ** (2.06)	0.011 * (1.70)	0.016 ** (2.17)
<i>GROWTH</i>	-0.131 ** (-2.33)	0.010 *** (2.81)	0.007 ** (2.15)	0.011 *** (2.97)
<i>PPE</i>		0.040 *** (2.53)	0.044 *** (2.61)	0.036 ** (2.34)
<i>INTAN</i>		0.051 (1.31)	0.035 (0.96)	0.055 (1.42)
<i>AGE</i>		0.005 * (1.74)	0.006 ** (1.97)	0.004 * (1.65)
<i>POWER_avg</i>	-0.092 (-1.36)			

^①测试表明,*AUDIT_4* 与 *AUDIT_10* 之间无实质差异,因此,本文只汇报了以 *AUDIT_4* 度量审计师选择的回归结果。

变量	Probit 模型 (因变量 = <i>AUDIT_4</i>)	主模型(因变量 = <i>TA</i>)		
		全样本	强控制权组	弱控制权组
<i>CROSS</i>	0.155*** (3.73)			
<i>ZONE</i>	0.091*** (2.56)			
<i>LOSS</i>	-0.116* (-1.81)			
<i>IMR</i>		0.029* (1.72)	0.020 (1.51)	0.027* (1.77)
Constant	-5.224*** (-9.61)	-0.082*** (-4.51)	-0.076*** (-3.62)	-0.087*** (-4.12)
年度与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7027	7027	2509	4518
<i>Chow-test</i>	—	—	F = 3.16*	

注:Probit 模型括号中为回归系数的 *z* 值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其他稳健性测试。在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还完成了一系列的稳健性分析:①高管控制权变量的具体构造方法可能对实证结论产生干扰,因此,本文以 *POWER* 变量的原始值为基础,遵循从小到大的原则进行序列分组(共计十组),此时 *POWER* 指标的值即为排序后所处的序号数;②管理层对企业经营行为的作用发挥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和积累性,而新上任不久的 CEO 通常尚处于情况熟悉阶段,此时,企业的财务策略或许并不是管理层特质的良好反馈。因此,本文在研究样本中删除了当年出现过 CEO 更换的记录。在对上述研究变量或样本的调整完成后,再次对相关模型做了回归检验,发现主要的实证结论基本上保持一致,并没有出现与前述经验证据相悖的异质变化。

五、结论与启示

当前,伴随“内部人控制”而催生的治理困境使得包括避税在内的企业财务决策不同程度地镶嵌了高管的权力寻租动机,并成为上市公司加强财务决策合规性、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潜在阻碍和隐患。本文利用 2008—2013 年的 7027 个上市公司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激进避税程度会因高管权力强度的擢升得到显著加强,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则助长了公司的税收激进性,而强

权高管的存在则进一步强化了外部审计对公司激进避税行为的促进作用。上述研究不但是对 Bebchuk 等(2002)提出的“高管权力论”基于避税这一具体的财务决策视角增添了来自中国的经验佐证,同时,对 McGuire 等(2012)关于审计师特征如何影响避税行为的研究在我国新兴加转轨制度背景下进行了重要补充。

立足于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厘清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的经济后果以及独立审计的治理涵义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启示:首先,既然强权高管更偏好于选择激进避税策略,因此,如何通过各种监管措施约束高管日益隐蔽的财务自利行为,则是公司治理改革应重点关注的问题,例如,可尝试引入大数据分析等新型科技手段加强对高管自利性决策的动态监管;其次,研究表明,传统意义上理应具有更好的声誉形象和质量保障的“审计大所”并未能展示出备受期待的监督功效,这提示管理当局在逐步完善针对纳税人避税监管的同时,还应未雨绸缪地关注审计师特别是“大所”在客户避税决策中的利益导向及行为模式,通过加大法律责任风险、强化避税信息披露等手段,抑制其从事激进避税服务的源动力;最后,本文的研究还证实,在内部治理相对失效的环境下,以“大所”为代表的高声誉审计师可能成为了高管借避税

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挡箭牌”甚至“合谋者”,这表明,只有当优化审计师聘任决策与改善执业环境做

到内外兼修之时,独立审计的应有功效才能得以有效发挥。

参考文献:

- [1] Aghion, P., and Bolton, P. An Incomplete Contracts Approach to Financial Contracting[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2, 59, (3): 473 - 494.
- [2] Bebchuk, L. A., Fried, J. M., and Walker, D. I. Managerial Power and Rent Extraction in the Design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J].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02, 69, (3): 751 - 846.
- [3] DeAngelo, L.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1, 3, (3): 183 - 199.
- [4] Desai, M. A., Dharmapala, 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79, (1): 145 - 179.
- [5] Dyreng, S. D., Hanlon, M., and Maydew, E. L. The Effects of Executives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0, 85, (4): 1163 - 1189.
- [6] Fan, J. P. H., and Wong, T. J. Do External Auditors Perfor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in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East Asi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5, 43, (1): 35 - 72.
- [7] Finkelstein, S. 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2, 35, (3): 505 - 538.
- [8] Hambrick, D. C., and 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 (2): 193 - 206.
- [9] Hanlon, M., and Heitzman, S.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0, 50, (2): 127 - 178.
- [10] Kang, J. Y., and Ko, J. K. Tax Avoidance, Firm Valu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Korean Accounting Review, 2014, 39, (1): 147 - 189.
- [11] Ke, B., Lennox, C., and Xin, Q. The Effect of China's Weak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Quality of Big Four Audi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5, 90, (4): 1591 - 1619.
- [12] Laguir, I., Staglianò, R. How do Powerful CEOs Manage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 [J]. Economics Bulletin, 2014, 34, (3): 1361 - 1368.
- [13] McGuire, S. T., Omer, T. C., and Wang, D. Tax Avoidance: Does Tax-specific Industry Expertise Make a Difference?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2, 87, (3): 975 - 1003.
- [14] Morse, A., Nanda, V., and Seru, A. Are Incentive Contracts Rigged by Powerful CEO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11, 66, (5): 1779 - 1821.
- [15] Slemrod, J. The Economics of Corporate Tax Selfishness[J]. National Tax Journal, 2004, 57, (4): 877 - 899.
- [16] Weisbach, D. A. Ten Truths about Tax Shelters[J]. Tax Law Review, 2002, 55, (2): 215 - 253.
- [17] 蔡地, 罗进辉. CEO类型影响家族企业的税收激进度吗[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5, (9).
- [18] 金鑫, 雷光勇. 审计监督、最终控制人性质与税收激进度[J]. 北京: 审计研究, 2011, (5).
- [19] 刘文军. 审计师行业专长、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J]. 广州: 南方经济, 2012, (6).
- [20] 刘星, 代彬, 郝颖. 高管权力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视角[J]. 杭州: 管理工程学报, 2012, (1).
- [21] 陆菲, 胡永亮. 四大审计对企业税收管理活动的影响[J].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 2013, (1).
- [22] 魏春燕. 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客户的避税程度[J]. 北京: 审计研究, 2014, (2).
- [23] 吴昊旻, 吴春贤, 杨兴全. 产品市场竞争、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来自中国审计市场的经验证据[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5, (5).
- [24] 谢盛纹, 田莉. CEO权力、审计行业专长与税收激进度[J]. 南京: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4, (5).
- [25] 余宇莹. 公司治理与审计质量: 经验证据[M].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 [26] 张敏, 李伟, 张胜. 审计师聘任的实际决策者: 股东还是高管? [J]. 北京: 审计研究, 2010, (6).

Executive Control Power, Audit Supervision and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DAI Bin^{1,2}, PENG Cheng², LIU Xing³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y,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As importa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rrangement, both internal power distribution and independent audit should affect the firm's tax evasion decision. At present it is a major issue of increasing concerns for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 as for how management traits affect tax avoidance, while most existing literature related has ignored the role the executive power configuration played within. On top of that, tax avoidance policy made by executives is bound to be restrained by intermediary agencies, say, the CPA firms. So, the question remains, under an emerging and transitional market economy, whether external audit can play its due role in the inhibition of aggressive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ow further enhanced executive control influences the performance of external audit.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and enhance current studies related and figure out the question mentioned above, the article comes into being.

Based on the data of 7027 firm-year observations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8 to 2013,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executives' control power on the degree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s well as whether this relationship is affected by external audit.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1) The enhanced executives' control power can increase the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 which shows that firms' tax avoidance strategy implies the power rent-seeking motive of executives; (2) Whether based on the "Big Four" or "domestic top ten" auditors as the measure of audit quality, external audit with high quality also can boost the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 revealing that independent audit hasn't played the desired functions of supervisio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3) Further empirical studies also show that the enhanced executives' control power can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xternal audit and the company's tax avoidance, indicating that the big CPA firms with high reputation may become the shield or conspirator of executive's self-serving behavior via tax avoidance deci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empir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policy-making on enhancing the auditing independence and listed firms'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regulation.

This paper's possible contribution are as follows: based on studies on how executives' control power affect tax avoidance as well as on the role of external audit played therein, this article can both be seen as a vital complement to the "managerial power theory" proposed by Bebchuk et al. (2002) when corporate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is involved, and an extension to the current study on how differentiated auditors affect tax avoidanc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a (McGuire et al., 2012). It is of enormous value when it comes to understanding what possible economic repercussions may be caused by the exertion of executives' control power i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and what's the exact behavior patterns of external audit. Furthermore, it may offer more detailed clues on some significant guidelines and policy-makings such as, how to deepen the curr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 and improve auditors' independence.

This paper's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as follows: to start with,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ince executives with supreme control power might prefer aggressive tax avoidance strategy, then how to, via a variety of regulatory measures, rein the increasingly covert financial self-interested behaviors made by corporate executives is a key concern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 For exampl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may try to introduce new technology means such as big data analytics to strengthen the dynamic regulation on the executives' self-serving decision-making.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as "the big CPA firms" fails to achieve its due supervision role,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while perfecting tax avoidance supervision on taxpayers, ought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in advance to the interest preferences and behavior patterns of auditors, especially "the big CPA firms", when the latter decide to avoid tax for their big clients. Finally, this study shows that only when both auditor appointment decisions are optimized and the practicing environment is upgraded as well can independent audit play its due role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Key Words: executive control power; auditor; audit quality; tax aggressiveness

(责任编辑:月 才)